

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 顾黄初, 顾振彪著 .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9

(21 世纪语文教育文库 · 教师继续教育参考系列)

ISBN 7 - 80149 - 569 - 1

. 语... . 顾... 顾... . 语文课 - 课程 - 标准 - 中学 - 研究 语文课 - 教材 - 研究 - 中学 . G633. 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2333 号

21 世纪语文教育文库 · 教师继续教育参考系列

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

著 者: 顾黄初 顾振彪

责任编辑: 章绍武

责任校对: 杨蔚琴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1.5

字 数: 289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5000

ISBN 7 - 80149 - 569 - 1/ G · 060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小 引	1
第一章 中国现代语文课程发展的脉络	3
第一节 关于“为什么教”的问题——现代语文课程对 教学目标认识的演变	4
第二节 关于“教什么”的问题——现代语文课程对 教学内容认识的发展	11
第二章 中国当代语文课程改革的趋势	21
第一节 困惑与使命——中国当代语文课程改革的 背景	21
第二节 改变观念和改革现状——中国当代语文课程 改革的要求	29
第三节 与生活广泛联系——中国当代语文课程改革的 趋势	36

第三章 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	39
第一节 奇异生态中的规范化要求——语文课程与语文 课程标准	40
第二节 语文教材讲究系统组合——语文教材的概念及 其功能	43
第三节 对旧式文选型的突破——现代中学语文教材的 几个发展阶段	52
第四节 春天里孕育出无限希望——当代中学语文教材的 改革	57
第四章 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结构类型	75
第一节 两条线索和四个系统	75
第二节 系统组合的多向探索	87
第五章 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制与使用	93
第一节 重视教学的定向控制——教学目标的确定	93
第二节 众里寻他千百度——范文的选择和加工	107
第三节 集中串联和散点分布——语文知识的提取和 编排	116
第四节 构筑思维和操作的演练场——语文作业的 设计	122
第五节 无声的导游者——导学材料的编写	127
第六节 智慧显现于组合的灵巧——教学单元的 合成	138
第七节 由静态向动态转化——语文教科书的使用	144

第六章	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现代实用文剖视	160
第一节	人事景物的形象再现——现代记叙文剖视	161
第二节	信息的提供和求知欲的满足——现代说明文 剖视	172
第三节	发展理论思维的凭借——现代议论文剖视	184
第七章	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现代文艺文剖视	192
第一节	两种语文教学实用观——现代文艺文教学的 意义和作用	192
第二节	用真情拨动心灵的弦——现代诗歌剖视	196
第三节	品尝体现个性的人生况味——现代散文 剖视	207
第四节	展现人物性格的画卷——现代小说剖视	224
第五节	艺术舞台再现浓缩人生——现代戏剧剖视	244
第八章	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文言诗文剖视	256
第一节	历史长卷中的时代风云——文言散文剖视	257
第二节	民族精神铸成的文化瑰宝——文言诗歌 剖视	268
第九章	语文教材中其他品种的编制和使用	280
第一节	三种思路的优化融合——语文教学指导书的 编制和使用	280
第二节	信息符号的第二次转换和变形——语文视听 教材的编制和使用	285
第三节	从有限向无限延伸——语文课外辅助教材的 编制和使用	307

第十章 新世纪语文课程教材建设展望..... 328

 第一节 三件基础性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
 语文课程教材新体系打好基础..... 328

 第二节 一项开拓性工程——对国外母语教材内容作
 比较研究..... 335

 第三节 在继承中求创新——对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的
 几点设想..... 350

后 记..... 357

序

在基础教育阶段，语文学科历来被视为“基础中的基础”，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特别关注。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把推进素质教育置于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地位，于是作为培养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性工程，语文学科的改革也就越发显得重要和迫切。

从 1998 年下半年开始掀起的那场有关语文教育问题的社会大讨论，尽管其间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但总的说来，对我们在世纪之交冷静地反思语文教育过去和现状的是非得失，正确地预测新世纪我国语文教育建设和发展的趋势，从观念、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进一步改革语文教育，提高语文教育质量，是大有裨益的。

人们在思考、在探讨：对于语文学科的性质及其教学任务，我们的认识还应该有哪些发展和突破？语文学科的教学完全是重在引导学生“研究语言”，还是重在引导学生“学习语言”、“学习语言的实际运用”？语文学科的这个性、那个性，究竟哪个“性”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辩证地来理解？语文学科教学中，究竟应该怎样摆正“语感”、“创新”、“顿悟”等等的位置，使之各得其宜、各得其所？语文教材的革新与语文课程的改革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在语文学科教育改革过程中，究竟应该怎样引进现代语言学、现代文艺学、现代心理学、现代脑科学、现代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从而根本改变传统语文教育的内容和模式？……

有人在困惑中慨叹：教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语文，到世纪之交竟不知道该怎么教了。

更多的人在自励自奋中抬起了头：语文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是个“学无止境”的领域，也是个“开掘不尽”的矿藏，如果不甘平庸，要努力成为一个科研型、学者型的语文教师，就得坚持不懈地学习、探求、实验、总结，就得继续接受教育，甚至终身接受教育。

现代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理论体系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才逐步形成的。法国著名教育家保罗·郎格朗，1965 年 12 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届促进成人教育国际委员会上首次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构想，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他的著作《终身教育引论》（1970）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主席埃德加·富尔等人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972），便是现代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

中国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只是当时仅规范在教师岗位业务的培训之内。至于把“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概念引进我国的教育体系，并予以强调，则是跨入 90 年代以后的事。1990 年 10 月，国家教委在四川省自贡市举行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了各地开展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情况和经验，研究、探讨了开展此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及其他有关问题。随后，国家教委还印发了《关于开展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意见》（1991 年 12 月）等文件。1993 年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国家建立和完善岗位培训制度、证书制度、资格考试和考核制度、继续教育制度”，把“继续教育”首次确认为国家建立的一项制度。

为了加强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邀集专家学者研究制订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开发

指南》，于1998年7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讨论制定的《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年1月13日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其中提出要实施“跨世纪园丁工程”，通过全员培训和继续教育，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继而又在上海召开“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和校长培训工作会议”，颁布了教育部第7号令《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这就标志着中小学师资培训由过去的以学历补偿教育为主进入到以继续教育为主的新阶段，工作重点由单项知识或技能的培训提升到以提高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为重点的培训。从此一场规模宏大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全员培训，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意味着教育振兴、民族振兴的新纪元已经来临。

正是在教育事业发展和学科课程改革这样一个宏观的背景之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邀请语文教育界一些专家编撰了这套21世纪语文教育文库·教师继续教育系列，供中小学在职语文教师和即将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年轻同志，作业务进修之用。

对语文教育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形成所谓语文教育观念；不同的语文教育观念，形成语文教育的不同流派。李杏保、陈钟梁合著的《纵论语文教育观》，将对国内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诸种语文教育观念的基本特点、产生根源、演变过程以及对改革实践的主要倾向等等，从理论上加以评述。

语文课程改革方兴未艾，随之而来的语文教材改革也为世人所瞩目。顾黄初、顾振彪合著的《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将根据现代语文课程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和当代语文教材的编制经验，对我国语文课程教材建设和改革的必要性和发展趋势，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前提下作科学的概括和具体的阐述。

把心理学引进学科教育研究，无论在心理学界还是在语文教育界，都是期盼已久的学术追求。邵启扬、金盛华等合著的《语文教育新思维》，力图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观察、分析中

国语文教育的各个侧面，并用现代结构主义理论提出合理解决语文学科课程教材建设、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以及在语感训练中增进学生审美修养等方面问题的新思维和新途径。

教学过程由目标的确定到目标的实施，最后到目标的反馈和检测，是系统论在学科教学中的具体运用，它的是非得失决定于教学设计的科学合理与否。教学设计，历来被教师所重视；但要从理论上论证这样设计而不是那样设计的根据，在教学效果问题上说出个所以然来，恐怕不是每个教师所能胜任的。时金芳著的《语文教学设计》，将从哲学原理的高度，结合现代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的运用，为语文教学设计作多侧面的论证，使教师在设计教学过程时能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徐林祥主编的《语文教师继续教育指南》，是他和课题组成员经过3年的共同努力而取得的最终成果。该书既有语文教师继续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体系、办学模式、管理考核等问题的研究，又有语文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方案的探讨、语文教师教育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指导，还附有继续教育研究参考书目和语文教师接受继续教育推荐书目。它为师范院校中文专业改革教育教学工作、为中小学语文教师坚持在职进修，提供很好的参考依据。

出版社和我本人的愿望如此，是否真能如愿，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我们真诚地欢迎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正。

顾黄初

2001年3月25日于扬州大学

小 引

20 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封建制度的沉重枷锁，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获得新生，获得长足发展的伟大年代。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体现着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新思想、新教育起着唤醒民众、激励后代、培育新人，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在谋求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征途中，那些卓越的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往往同时也是教育家。他们不仅把教育看作是革命和建设的不可或缺的一翼，同时在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和各科教材教法等方面都要拨正航向，努力使之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今天，20 世纪的伟大历史已经翻过了最后的一页，“建设要靠科技，科技要靠人才，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跃入世界先进行列的重要战略思想。进一步改革教育、发展教育，正面临着一个最好的机遇。

中国的历史和世界各国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民族，一个有巨大凝聚力和旺盛生命力的民族，无不重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教育。这不仅因为本民族的语文反映着本民族的精神、传统、心理和文化积累，而且接受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也必须凭借民族语文这一基本的载体。因此，在中国，当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封建王朝衰朽没落的时候，教育普及、国语统一、文字改革几乎与摧毁封建帝制的革命烽火一起，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破旧立新的冲击力。代表着民族觉醒、民族新生的社会力量需要用活的语言、新的文字来取代死的语

言、古老的文字，以便更好地传播和接收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语文和语文教育的改革成了这一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实在是势所必然。

教育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教育宗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方法等一系列问题。而当新的教育宗旨一旦确立，新的教育制度一经形成，反映新的教育内容的课程教材建设就成了至关重要的课题。因为教育宗旨要通过课程教材来体现，教育制度的特点又必须通过课程教材鲜明地反映出来。“为什么教”的问题，首先必须在“教什么”中得到落实。语文教育的革新，是以语文本身的革新为前提、为先导，同时以新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为核心、为灵魂，而这二者又以课程教材的革新为载体、为渠道。因此，20 世纪初期的语文教育革新运动，首先就体现为语文课程教材的新生；20 世纪中叶，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语文教育革新运动，同样也曾经在语文课程教材的革故鼎新上倾注了巨大的心力。今天，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飞跃发展，随着新技术革命对人才素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民族语文教育的改革也必须以语文课程教材的改革为重要的主攻目标，使之更好地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的社会需求。这也就是 21 世纪对语文教育发出的热切的呼唤。

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是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的问题，尤其是中学的语文课程教材建设问题。作为研究和探讨的起点，是对中国中学语文课程在当代的发展作一个粗略的回顾。

第一章 中国现代语文课程发展的脉络

在 20 世纪的最初年代，指导学校教育的法规，有所谓课程纲要和课程标准。这是从日本借用的名称。课程纲要，近乎是现在所说的教学计划；课程标准，相当于现在的教学大纲。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严格意义上的语文课程标准是在 1923 年由当时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下属“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讨论制定，并颁布试行的。在此之前，无论是 1904 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还是 1913 年的中小学《课程标准》，都因为规定的内容简单笼统，语焉不详，不能算是具有规范作用的标准。所谓课程标准，其完备的形式应该简要地反映该学科“为什么教”（目的）、“教什么”（内容）、“怎样教”（教法）和“最低限度”（程度）等项基本内容。这些内容，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学实践中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原则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法定文件加以阐述。专家、学者们也得进行研究、讨论和试验。前者，反映国家在一定时期对该学科的性质、任务、教学宗旨和教学目标的确认，它对实践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后者，只是反映个人对该学科有关上述问题的认识和见解，对谁都只有启发、借鉴作用而没有任何约束力。当然，国家制定的文件，也必然要吸收某些专家、学者的理论观点，并使之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人人均应遵循的认识成果和行动规范；并且，这种认识和规范也必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们对学科本身认识的日益深化而不断变化和更新。1923 年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正

是在新旧教育思潮激烈交锋、教育革新派对语文教学领域各种问题展开充分讨论的背景之下产生的。本章重点阐述 20 年代学术界围绕“为什么教”和“教什么”两大问题展开的讨论。

第一节 关于“为什么教”的问题 ——现代语文课程对教学目标认识的演变

从课程的角度，对语文学科的教学作宏观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为什么教”的问题，即教学目的问题。1912 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了《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对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作了如下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这个教学“要旨”，沿用日本当时为学校语文学科规定的目标，不过，它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而提出，还是为历史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即：突破了过去读文只是为了作文的狭隘圈子，使“通解普通语言文字”和“略解高深文字”成为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读和写兼顾了起来；突破了过去作文必须重复、疏解、发挥圣贤之说的严重桎梏。把“自由发表思想”列为教学的又一重要目的，使语文用来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成为可能；突破了过去读文作文只是囿于少数圣经贤传的古奥殿堂，让一般意义的“文学”列入教学目的，使之成为“启发智德”的重要媒介。不过，《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规定的这些“宗旨”，写在纸上冠冕堂皇，考察实施情况却不免南辕北辙。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语文学科所学的“语言文字”，还纯粹是古语古文，所谓“普通”与“高深”只不过是近代文言文与古代文言文的区别而已。语言文字如果脱离了现实中人们习用的口头语和白话文，那么“自由发表思想”云云也就只能是一种理想。至于“兼以启发智德”一

说，含义也比较笼统。所以，为了根据当时新的教育思潮，科学地制定出语文学科的课程标准，首先必须对它的教学目的重新加以探讨。

1921 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杂志》社编辑主任的周予同（1898～1981），为组织课程标准的讨论，在 1922 年《教育杂志》第 14 卷特发号外专辑。他本人在专辑上发表《新学制的国文课程》一文具体贡献了他的主张。在此之前，他在第 14 卷第 1 号上曾发表《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一文，对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周氏首先肯定：“中学校是普通教育，是大学或专门教育的预备；不是狭义的职业学校，也不是大学的文科。中学生在学问上，是预备升学的；在社会上，是养成一个完全的人。”根据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即：“A. 人人都用国语或浅近的文言，自由而敏捷的发表思想感情，或记述事实，绝对没有文法上的错误。B. 人人能懂得中国文学和学术变迁的大概。”周氏的这一表述有这样一些特点：强调“国语”和“浅近的文言”并重；强调发表的“敏捷”性；强调“文法”知识的正确掌握；强调中国文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初步了解。但它也有明显的不足：相对而言，重写轻读，重写轻说；国语或浅近文言，不分主次，并认为中学生也应该会写浅近的文言文；把文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掌握同语文工具的掌握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忽视了中学生的品德教育，这是从《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后退了一步。

这里牵涉到四个重要问题：一是培养中学生文言文的写作能力应不应该列入教学目的？二是培养和提高中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应不应该列入教学目的？三是陶冶和锻炼中学生的思想品德应不应该列入教学目的？四是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应当怎样看待？

对于前面三个问题，“五四”以前就在教育界高举革新旗帜的浙江一师就曾经提出过自己鲜明的主张，他们在自拟的《国文

教授法大纲》中规定：“目的 1、——形式的。使学生能够了解用现代语或近于现代语——如各日报杂志和各学科教科书所用的文言——所发表作文章，而且能够敏捷、正确、贯通。目的 2、——形式的。使学生能够用现代语——或口讲，或写在纸上——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要自由、明白、普遍、迅速。目的 3、——实质的。使学生了解人生的真义和环境的现状。学校各种科目，无非是一种做人的工具。所以国文科的内容，也应该注重人生和环境，使学生能够了解做人的道理”。浙江一师诸同人的这一表述，确实为历史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强调用现代语或近于现代语的文言进行阅读，达到敏捷、正确、贯通，是阅读教学的目的。至于写作，则一律用现代语，因此，文言文写作不是教学目的。现代语的应用，不光是纸上能写，还得要求口里会讲，把口语表达能力提到应有的位置上来。强调学语文就是学做人，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但这一表述也有缺陷：忽视文学教育；忽视文法、修辞等语言教育。

1920 年，陈启天在《少年中国》第 2 卷第 1 期上发表《中学的国文问题》，详细地阐述了他对语文学科教学目的的见解。他把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分为“主目的”和“副目的”。他所悬拟的主目的共三项：一是“要能说普通语言”。即要教会学生用国语流利地说话，“有意而能直接用口道出”，没有语法上的错误。二是“要能看现代应用文和略解粗浅美术文”。他认为中学生只要能看现代应用文就够了，不必学专门的骈文和古文。此外，中学生还要能看点美术文，如古典诗词，为的是“涵养性情”，启发文学上的兴趣，所以只须“略解粗浅的”，就足够了。三是“要能做现代应用文”。他强调“中学生顶好完全学白话文”，但也指出“浅近文在现在还有一部分的势力——升学和别的需要——不得不兼学浅近文”，所以在写作方面，应以学写现代的白话应用文为主，兼学浅近文言的应用文。陈氏规定的副目的有两项：一是“要启发思想，锻炼心力”。他认为旧式国文教

学，“学生死读先生死讲”，“弄得学生思想闭塞，心力迟钝”，弊害严重，所以他强调“国文教授应该注意促进学生的思考力、观察力、批评力、研究力等，使他们得到求学和作事的无上工具”。二是“要了解和应付人生和自然”。他认为学校中修身、历史、法制、经济等科，“是使学生了解和应付人生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科，“是使学生了解和应付自然的”；地理则“是供给学生人生与自然相关的知识的”；而“国文教授也是帮助这些科学，使学生对于人生和自然了解的程度加深，应付的能力加大”。陈氏的这一表述，其价值主要在于：将语文学科特有的教学任务，列为主要目的；将语文学科与其他各科共同肩负语文学科又有其特殊功能的任务，列为副目的。这样就把语文学科的多种教育教学任务，分清了主次，鲜明显示出其间的区别和联系。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发展学生智力（心力）、训练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任务。把普通话的口语表达和现代应用文的读写能力，提到了十分显著的重要地位。注意到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但是，从陈氏的表述中，我们也分明地看出，他在强调应用文的同时，多少忽视了文学教育的因素。

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进行教学改革的孙工，是20年代初提倡白话文和文艺文教学的激进派人物，他在1922年提出了他们这一派人物所拟制的语文学科教学目的，共三项：“（1）人人有迅速阅看国语书报的能力，以启发思想；并且了解现代思潮底大概。（2）人人有精密鉴赏国语文艺的能力，以培养美的感情；并且了解彼底变迁和性质。（3）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地明确地敏捷地发表情思，记叙事物。”孙氏的这一表述，显然吸纳了当时革新派的一些较有价值的观点，如语文能力培养和思想教育、美感教育的结合，重视文学的变迁和性质的了解，强调发表的敏捷性等等。但这一表述的独特之处也十分明显，即强调言文一致，把国语的教学和普及列为新时代语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之一；强调国语文艺的鉴赏，把现代新文艺的教学列为教学目的。正如孙氏所